

扶輪對話

人人有正義

國際公義使命團領導人蓋瑞·霍根

直言如果基本安全不保，
人道工作的意義就無法彰顯



VIKTOR MILLER GAUSA

蓋瑞·霍根

1994 年時，百餘日百萬人種族屠殺的震撼仍在盧安達餘波蕩漾。這個東非國家數十年的內戰衝突在這場屠殺中達到頂點。

當時，年輕的蓋瑞·霍根 Gary Haugen 是美國司法部一名人權律師，率領一支聯合國種族屠殺調查小組，搭機飛抵首都吉佳利，收集起訴戰爭罪犯所需的證據。

霍根回憶說：「基本上該國沒有政府在運作。沒有主管機構管控，該國陷入一片混亂。許多人想要幫忙，送來食物及藥品，提供住宿及教育，可是碰到暴力的問題時，很少人挺身而出。」

霍根在 1997 年成立國際公義使命團 (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 來處理開發中國家的暴力問題。該組織有 17 名現場調查職員，與當地調查人員合作，解救暴力受害者，支持倖存者，強化執法，並將暴力罪犯繩之以法。在他 2004 年出版的著作《蝗蟲效應：為何終結貧窮要先終結暴力》(The Locust Effect: Why the End of Poverty Requires the End of Violence) 當中，霍根主張人民的基本安全受到威脅時，全球對抗貧窮的進展也就沒有多大意義。

在首爾舉行的 2016 年國際扶輪年會中，霍根向扶輪社員談論對全球赤貧者傷害力最大的一種暴力，是他所謂的「日常暴力」——強迫勞動，也就是奴役。他說：「奴役並不是歷史遺毒。」他指出全球估計有 3,500 萬受到奴役的人，人口販子獲得 1,500 億美元的暴利，卻很少面臨司法起訴。「情況比以往更普遍，更殘暴。但也比以往更可能遏止。」

霍根和投稿作家莎莉安·普萊斯 Sallyann Price 在首爾會面，談論在發展中國家處理暴力及安全的重要。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貧窮及暴力有何關連？

霍根：當人們想到世界最貧窮的人時，通常不

會想到暴力。他們想到的是飢餓、疾病、缺乏教育及工作機會。可是一樣重要的是日常的暴力威脅，而不一定是戰爭、種族屠殺、及大規模暴行那種登上頭條的暴力。

「這個世界現在一分为二，一邊是有能力負擔保護自己費用的人，另一邊是被遺忘在無法無天之混亂中的數十億人。」

破壞力更強大的暴力形式是我們所謂的日常暴力——也就是性暴力、警察濫權、侵佔土地、以及奴役。每天，這些形式的暴力都讓一般貧民很難改善他們的處境。你可以給予各式各樣的物品和服務來紓解貧困，可是如果你無法遏止霸凌者的雙手，那些有權力奪走一切的雙手，你不會看到你想要的進步。

濫用權力是一種非常容易瞭解的人類常態。那是孩子在校園裡會瞭解的事：總有一個比其他人更強壯、更高大的人，濫用力量向受害者強取豪奪，無論是午餐錢或是財物或是他們的尊嚴。你在成人世界也看到同樣的狀態；隨著時間濫用權力只是變得用更成人化、更暴力的方式，規模也更大。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對扶輪國際年會的演講尤其著重在奴役這個議題。為何對扶輪這群人傳播這樣的訊息？

霍根：我們目前處於歷史的關鍵時刻，各種力量彙整在一起，有可能在我們有生之年終結奴役。有史以來首次，奴役他人在各地都是違法的。這是自古以來頑強存在的罪惡，可是已不再是全球經濟的中心議題。

扶輪展現出其獨特的能力，可以全力聚焦在一個不應存在的全球性問題。看看小兒麻痺的例子：我們有一個成效良好的疫苗，我們同

意每一個人都應該免於罹患這個疾病，可是要做到這點還是有差距。同樣地，每一個人應該不受奴役，沒有父母應該要擔心孩子被奴役。我們知道有效執行法律再加上妥善支持倖存者，便可大大減少奴役以及整體的暴力。扶輪社員在根除小兒麻痺的過程中，展現出我們要成功所需的專注與決心。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對科學家史蒂芬·品克 Steven Pinker 的反應如何？他在《大自然的善良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一書中，主張目前人類歷史中暴力最少的時刻。

霍根：如果你綜觀人類歷史，平均來說，我們目前的暴力的確少多了。那是好消息，因為這顯示進步是可能的。可是試以小兒麻痺來比擬——罹患這個疾病的人確實變少，可是這表示我們的工作完成了嗎？就像小兒麻痺一樣，殘留我們世界的暴力更集中在最貧窮者的身上。

較富裕的國家大規模提供某種程度的安全與執法，可是在開發中國家，個人安全經常表示得雇用私人保全。這個世界現在一分為二，一邊是有能力負擔保護自己費用的人，另一邊是被遺忘在無法無天的混亂、經歷極端暴力的數十億人。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社會更有力量的人，像扶輪社員，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來改善這種局勢？

霍根：在開發中國家的許多地方，司法制度通常支離破碎，擁有財富及資源的人並不仰賴這個制度。每個文化都會辯論政府的角色以及它應該提供的服務的範圍，可是無疑的是最基本的服務應該是能保障人民的安全。有機會擔任領導者的人必須投資公共安全，讓所有的人民得享同等的安全。

開發中世界最常見的暴力幾乎都已是違法

的，這點很好。但問題不在於沒有法律規範，而是在於沒有執行法律來保護每個人。這就是我們國際公義使命團的重點。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何時發現這種模式？

霍根：大學畢業後，我住在南非。當時的最大問題就是種族隔離危機。我在那裡開始明白生活在一個暴力壓迫及虐待的社會是怎麼回事。法學院畢業後，我到美國司法部工作，專門處理美國警察濫權的問題。我開始明白無論你身在何處，無論你置身哪個國家，有權力的人——無論是政界或警界——如果不必負擔後果往往都會濫權。1994 年我被派往盧安達，負責聯合國在當地的種族屠殺調查，我看到針對貧民的暴力問題。許多人試著幫忙，送來食物和藥品，提供住宿和教育，可是談到暴力問題時，很少人會挺身而出面對這項難題。在我看來，這個時代的奴役問題也是類似的：我們注意到它，我們可以阻止它，就看我們要不要負起責任。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國際公義使命團如何協助受暴力荼毒的社區？

霍根：在開發中世界的許多地方，人們都不再對執法單位會保護貧民不受暴力一事抱持希望。我們的工作證明那是可以改變的。重燃希望就是扭轉局勢的推動力。

我們從和當地主管機關合作做起。我們招募當地一群律師、調查員、及社會工作人員，開始處理個別案件。當我們試著將罪犯繩之以法時，我們開始看到刑事司法制度有缺失的地方。

當我們開始處理案子後，我們進行一項基準調查來測量不同類型的暴力盛行率及警察和法院的成效。以這兩條基準為基礎，我們便可測量刑事司法制度何時開始改善，暴力何時開始減少。歷經數年數百個案件後，我們證明讓

破碎的執法系統轉變為一個有效保護貧民的系統是可能的。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如何測量進度？

霍根：成功的一個測量指標是犯下某個罪的相對容易度或困難度。柬埔寨是個很好的例子。15年前我們在那裡展開工作時，你到金邊後，1小時內便可以輕鬆找到一名童妓交易，現在這件事困難許多。我們在那裡的計畫著重在強化刑事司法制度讓娼妓販子坐牢的能力，迄今我們見證過數百件判刑的案例。我們的基準研究發現當地多達 30% 的性工作者都是兒童，這個數字現在已經下降至近 1%。此外，因為柬埔寨政府目前能有效執行法律，已經不需要國際公義使命團。這就是我們的終極目標。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國際公義使命團如何判定介入的地點？

霍根：國際公義使命團使用多元的標準來評估未來計畫的地點，包括犯罪盛行率以及政府和執法單位對打擊犯罪的政治意志力。因為我們的司法制度轉型模式其核心在於建立我們服務的國家及社區其司法制度的效能，因此很重要的是執法體系裡一定至少要有一些處理問題的決心。

「有機會擔任領導者的人必須投資公共安全，讓所有的人民得享同等的安全。」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扶輪社員在規劃開發中國家的人道援助計畫時，如何協助維持社區安全？

霍根：詢問當地人的需求，與當地處理這些需求的團體聯繫。因為一般人比較不會談論

暴力，扶輪社員應該要非常用心才能把對話引導到探討某些特定的問題。一旦展開對話，聚焦在這項議題後，你就會開始再三發現這個問題。

就計畫的永續性及責任方面來說，扶輪已經提高卓越的水準。可是暴力反擊的方式和飢餓或無家可歸不同。如果你處理暴力，你可能最後會讓自己或多或少置於險境。有意願面對這項挑戰就是一個可喜的訊息。

一起對抗奴役



數百萬人正因商業利潤而失去自由。大規模移民、貧窮、天災、

及衝突，造成弱勢的成人和兒童置身於被剝削的處境。沒有國家或社區倖免。雖然奴役在各地都是違法的，可是卻很能發生在你的周遭。扶輪社員反奴役行動團體 (Rotarian Action Group Against Slavery) 透過其計畫、活動、服務計畫來提高認識，並幫助扶輪社員採取行動對抗奴役及人口販賣。該團體由 65 個國家各地 1,600 名成員及支持者組成，支持世界各地的扶輪社的相關行動。

扶輪社員行動團體開放給扶輪社員、扶輪社員眷屬、及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加入，一起支持扶輪社及地區規劃及推動相關專業知識領域的服務計畫。想要加入者請上網至 ragas.online。